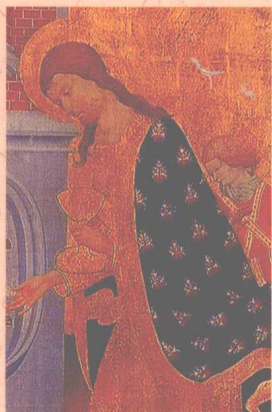




名家名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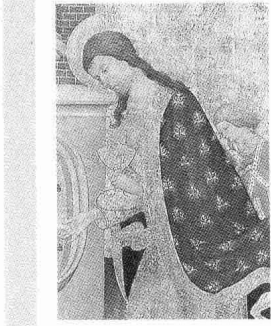


基督教与 近代中国社会

顾卫民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顾卫民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名家名著)

ISBN 978 - 7 - 208 - 09146 - 7

I. 基... II. 顾... III. 基督教史—中国—近代
IV. B97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33902 号

责任编辑 毛志辉

封面设计 王小阳

· 名家名著 ·

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

顾卫民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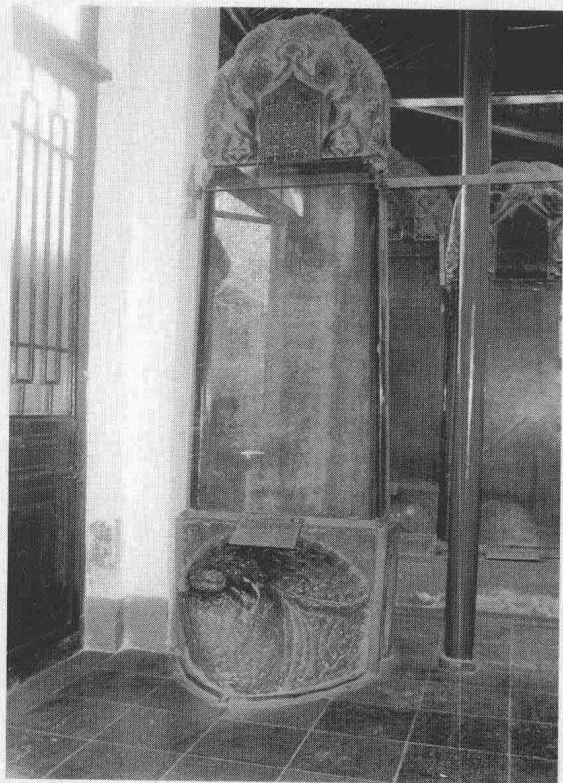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 × 965 1/16 印张 28.25 插页 8 字数 467,000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09146 - 7/B · 805

定价 45.00 元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泉州的聂斯脱里石刻





左上：元代来华方济各会士、汗八里总主教蒙高维诺
右上：耶稣会士利玛窦像
左下：耶稣会士汤若望像



左上：第一位中国籍主教罗文藻像
左下：新教早期来华马礼逊牧师像
右下：新教第一位中国籍宣教士梁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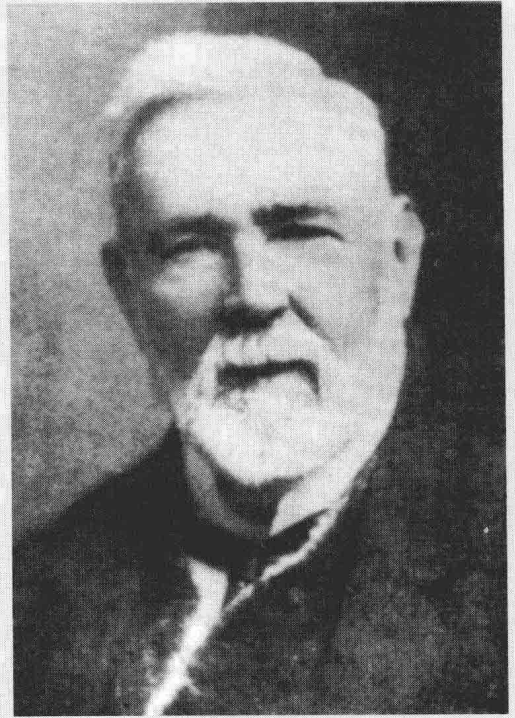


道光甲午年四月

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

知者不惑 仁者不憂 勇者不懼

愛漢者纂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

1833年由传教士郭实腊创办的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美国传教士林乐知



传教士翻译家傅兰雅



←戴德生与内地会传教士

↓内地会在山西的一座平民医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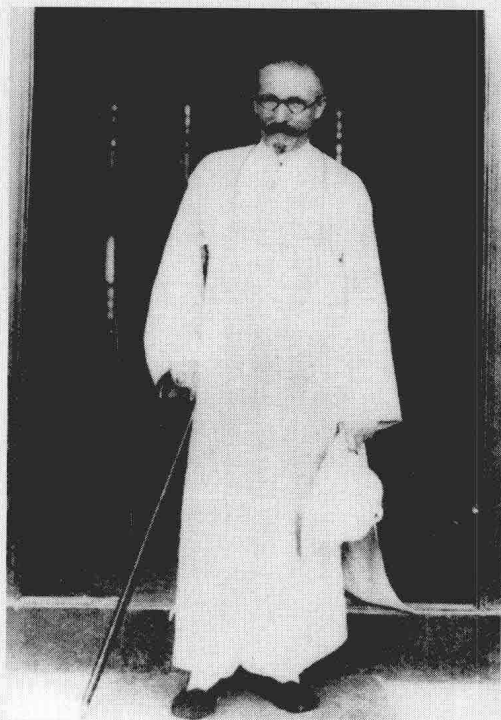




“庚子事变”中山西太原发生教案的地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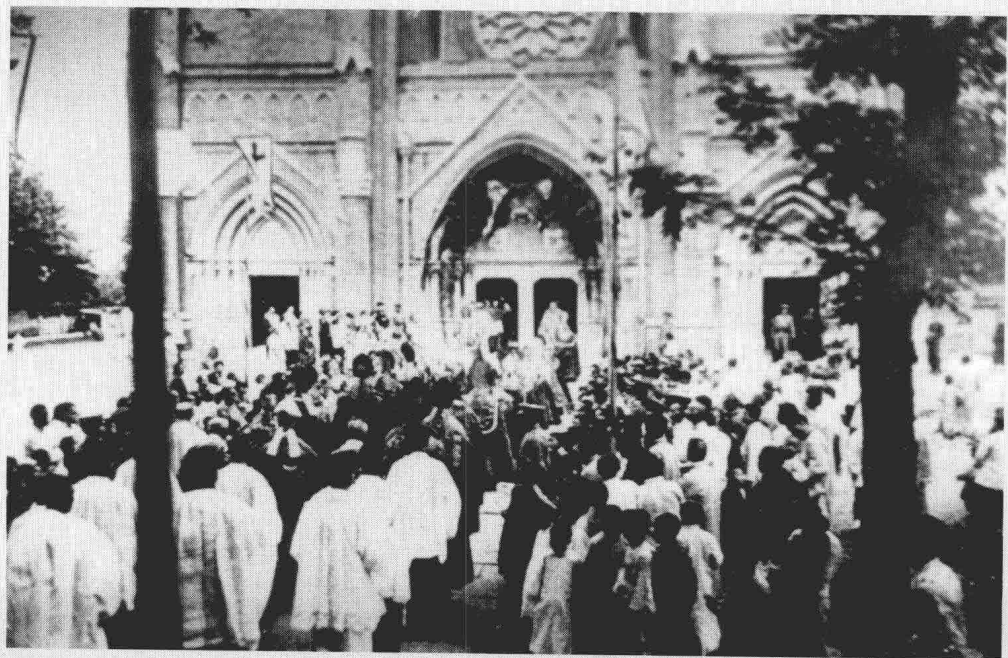
20世纪内地会的一个中国传教员家庭



1922 年来华的首任天主教宗座代表刚恒毅



著名的中国天主教知识分子马相伯



1924 年上海第一届天主教全国教友会议



刚恒毅率六位中国籍主教赴罗马接受祝圣



比利时天主教传教士与中国农民谈话



序

杨国强

在近代来华的西方人当中，传教士是一个强毅力行的群类。与谋逐一己之利的商人相比，他们的执意进取来自于内心的信仰。因此，当中国的海禁初开之后，西洋的商人还在口岸和沿海忙忙碌碌地营生，传教士中的许多人却已经离开了海岸线，向着深不可测的腹地走去。随后，穷乡僻壤之间也竖起了一个一个十字架。他们把基督教送到了中国人中间，也把自己送到了中国人中间。由此显出来的宗教热忱里当然包含着为上帝传播福音的真诚。然而宗教的信仰和宗教的热忱又是一种非常容易转化为强聒的东西。孔夫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走入民间的传教士们却大半喜欢己之所欲必施于人。他们自信能够普渡中国人的灵魂，但他们中的多数人其实又并不了解中国人的灵魂。这种隔膜，使强聒的西教常常会搅动文化、搅动历史、搅动民族战争失败留下的创痛，把传教士牵入忿争、词讼和教案里去。这个过程绵延起伏，写照了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的一面。

与这些孜孜矻矻把教义、教堂造到民间去的人们相比，传教士中的另一些人则更多点宗教以外的关怀，他们在中国的事业和生涯大半都越出了教堂的门墙。时人记叙 19 世纪后期的情状说：“时广学会督办李君提摩太，方自沪走京师，日以新学之益，遍告达官贵人。诸君皆乐与之游，聆其议论，靡不倾倒，而京师名下士，及外僚之入觐者，如王爵棠方伯之春，程从周军门文炳，龙觐臣军门殿杨诸

公,簪裾盛会,无虑百数。”这种场面显出来的风采显然并不是教义本色。然而中国人的观念却因之而节节变迁。在李提摩太之前和李提摩太之后,还有许多本以布道为天职的教会中人热心于办报、译书、经营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欲用新知沟通中西。他们因之而常被士大夫称作“西儒”,以区别于寻常的“传道士”。这些人四播西学,而文字之间每多溢出个人的情感。林乐知说:“余美国人也,而寓华之日多于在美之年,爱之深,不觉言之切”。李佳白说:“余居中国十余年,言语、饮食、衣服、居处,无非华也,亦既自视华人矣。履华之土,即受华之惠,每思披肝沥胆,有以报称。”他们流露出来的善意未必都是假惺惺的做作。但他们又常常要急迫地为中国人筹划未来,其善意之中遂不能不搀入用西方人的面貌改造中国的意愿。李提摩太、林乐知和李佳白等等都是被西方教会送到中国来的,他们的历史行迹反映了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又一面。

在19世纪的后50年里,基督教曾影响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旧式农民战争,使成千上万的小农成了太平天国的老兄弟和新兄弟;也曾触发过反洋教的义和团运动,使众多的教士与教民成了被人追杀的大毛子和二毛子。进入20世纪以后,信教的中国人和反教的中国人都不再怀有那么多的情绪和意气。上一代善以新学游说中国时政的传教士已渐次凋谢,后起的一代则面临着另一种时势,多半更愿意把精力用于奉侍上帝。于是,教会中的人们便能够在理性的自省中反思教会的历史。尔后出现的中国教会本土化,说明了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又导致了基督教本身的变化。

卫民治传教史和中外关系史多年,是一个肯坐冷板凳的人。冷板凳上消磨的光阴累积了学识和学力,使他能够驾驭一个并不轻松的题目,写成《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一书。宗教史是个多迷雾的领域,与百年新陈代谢舛结在一起的基督教入华史尤多雾气。隔着雾气论史,非常容易只见一面,不见另一面。卫民的优长则在于对历史的真实抱有一种敬意,并想在叙史的时候努力再现这种真实。所以,《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一书常用心于写出鸟瞰下的多面和细节中的多面,由此呈现出来的是矛盾和曲折,但历史过程的本来面目却因之而显得清晰了。

卫民撰《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须与百年来的中西人物作神交。由此产生的对于人情物态的悟解是史学给人的造就之一。然而史学又是一种耕耘多于收获的学问，历史著述中的每一点深沉寥廓都是在长久的寂寞中体验出来的。卫民常与孤独相伴，因此而有一片心头的宁静。当他在笔下一段一段地叙述出已经过去了的那个时代的时候，用来充饥的则常常是买来的盒饭。离他住处两百米之外，希尔顿饭店天天在用灯光营造的辉煌夜色诱发人间的浮躁，但在他的世界里，有一盏长明的台灯就已经够了。咫尺之间，冷者自冷，热者自热。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这正像是历史学家的命运。他们很少应和浅薄的浪漫主义，然而他们的著述却往往能够留存得更久一些。

1995年6月于上海社科院历史所



自序

基督教自唐朝景教入华,历经元代天主教东传,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再度梯航而来,直至近代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的大规模输入,数起数落,历时弥久,在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留下了深刻的印痕,引起了中国学人的研究兴趣。尤其在 20 世纪以后,在陈垣、张星烺、冯承钧、向达、徐宗泽、方豪和罗光等教中和学界前辈的倡导与开拓下,中国基督教史终于成为中西交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教会的历史作为一门学科,照理应该占据其应有的位置。然而,长期以来,由于政治史的研究方法和思维习惯一度成为历史研究中替代一切的主流,教会历史或者被置弃,或者流于公式化的陈述。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有不少人至今仍然认为,宗教只是世界的影像在人脑中的颠倒反映。尽管我国宪法明文规定了宗教信仰的自由,以及教徒的权利及义务。但是,就基督教而言,正如教会领袖丁光训主教指出的:“从大的环境来看,我国基督徒一百几十年来始终处于极少数的地位,被非基督教及敌视基督教思想和势力从四面八方包围着。新教的人数至今不到人口的百分之一。我国仍有那种以激进自命,与宗教为敌的人,利用一些新口号的声势,制造加罪宗教的舆论。”(《金陵神学文选·序》第 3 页)。宗教在历史上的产生和发展,有其自然的原因。时至今日,宗教亦未消亡而且将长期存续下去,这是由它在历史中的合理性决定的。盱衡世局,科学与技术的进步,资讯与

交通的发达,已远非古人或近人所能想象。然而,仅仅是科技的进步,并不能给人类的生活带来幸福和平衡。洞察西方社会弊端的英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汤因比曾指出:“科学的进步,通过技术的应用,给人带来统治别人,统治人以外的自然力量。所谓力量,在伦理上是中性的,可以用于善的方面,也可以用于恶的方面。……科学技术力量对人生命的影响,取决于使用这种力量的人的伦理水平。”(《展望二十一世纪》第410页)我们并不一定认为宗教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唯一指南和归宿,但是,人类需要改善自身的精神生活,提高自身的伦理水平,在这个过程中,宗教曾历史地显示了它内在的合理性。这也是我们要研究宗教及由信徒组成的教会,在人类历史和社会中的演进、嬗变以及相互影响的原因。

本书列于“近代中国社会史丛书”之一种,要求从社会史的角度阐述教会历史。这既是先师陈旭麓先生的构想,也是我个人的志趣所在,并自始至终深加考虑。

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可分为唐朝的景教、元代教廷使节的东来,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在中国的活动,近代天主教的复归与新教的输入四个历史时期。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基督教自始至终存在着一个如何与中国本土的社会与文化互相沟通、适应与融和的问题。综观历史,唐朝的景教虽一度呈现“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景象,但是,由于景教教士在释经时过多地使用了佛教的语言,上层教士也将主要的精力花费在结纳权贵之上,因此社会上的人们将景教视为佛教的一支,而当上层政治斗争以灭佛的形式波及景教时,它便因缺乏下层信众的基础衰亡了。元代东来的教廷使者和天主教教士,以其宗教的热忱使教堂和十字架重新矗立于从汗八里到中亚细亚广大的土地之上。元代是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中国的王朝,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被置为异类。这种做法,使蒙古族的统治与汉族的社会文化之间划了一道深深的沟壑。从现有的教会史料中看,西来的天主教传教士的宣教对象,主要是蒙古族以及各类色目人,在有元一代,天主教会在建立本地化教会和向汉人传教的工作几乎是一片空白。所以,当明太祖朱元璋以光复汉室率军北上,攻陷大都时,天主教很自然地被视为蒙古的文化,随着元朝的覆亡

而消失于历史的舞台上。

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明清之际来华的耶稣会士,开启了基督教与中国社会和文化互相沟通的先河。他们那一代人既忠实于上帝,又具有足够的睿智与度量。因此,他们并不想把上帝与中国社会对立起来。其传道之际,多取径于教义和儒学的沟通,在渐进之间,不仅获得士大夫的友情,而且进入了宫廷之中。然而好景不长,随之而来的“礼仪之争”阻断了这一进程。我国教会史学家陈垣说:“当时名士高僧攻教虽烈,而天主教并不因此少衰。”“顾何以康熙以后,天主教大不如前,别有原因在。先是利玛窦派以为中国人尊孔敬祖,与崇拜偶像不同,可以通融办理。而龙华民则反对甚力,其后他会教士至者渐众,大都不通汉学,力斥耶稣会士之非,遂以其事讼于罗马。教皇先后派钦使铎罗、嘉乐来华查办,两人皆不谙汉语,何论汉学,故贸然判定尊孔敬祖为异端,不许通融”(《基督教入华史略》)。于是,天主教遂为朝廷所疑忌,为士民所排拒,在百年禁教政策下沦为像白莲教一般的秘密宗教。

历史进入近代以后,天主教和新教终于在中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无论是教会的数目,信徒的人数,都比以往任何时候规模更大。然而,这种现象的背后却潜伏着很大的隐患。近代基督教入华,是在《黄埔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等一系列由西方列强迫订的不平等条约保护下进行的,它本身的活动也与西方殖民主义侵华扩张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这使得中国人因民族矛盾而排教,也使教会无法依靠宗教本身的力量与中国人进行心灵上的沟通。同时,近道来华的传教士又多半挟有战争打出来的民族优势,在19世纪盛行于西方的所谓“进步”观念的支配之下,他们对中国的文化知之甚少,甚至觉得无须尊重中国文化。西方人向中国传播教义,但老是希望接受了教义的中国人与他们一样西方化。这种倾向,使基督教与中国社会之间的融合成了一个难题。本书在论及20世纪以后教会历史的四章中,专辟两章即“挑战与回应”与“中国教会的自立”,前者讨论了中国教会在时潮和政潮的冲击之下对社会的反应,后者则叙述了中西教会人士感应于尘世的激荡,而对教会的过去与未来所作的反思和忧思,从而